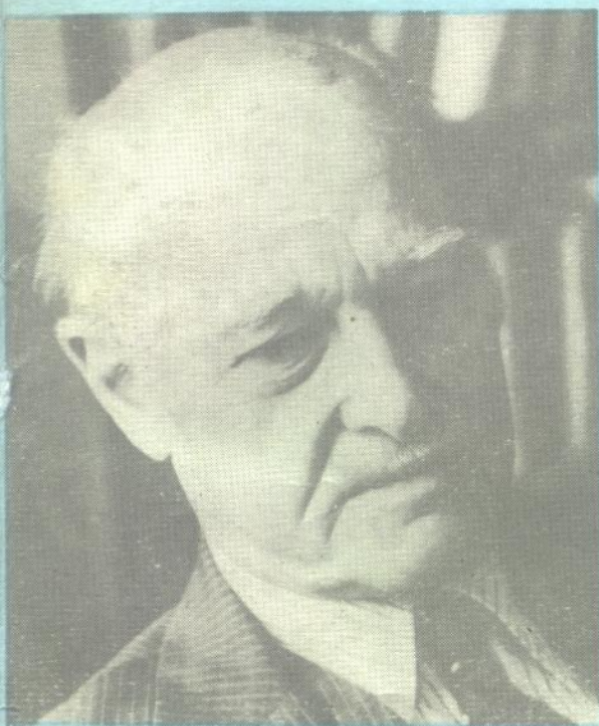


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

张小明 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27.5

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

张小明 著
李铁城 审订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035423

(京) 新登字 157 号

2006/6/20

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

著者：张小明

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编：100083)

发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46 千字

印张：5.5 印张

版次：199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书号：ISBN 7-5619-0407-X/D·01

定价：5.50 元

序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曾极大影响美国对前苏联的外交政策、长达四十年之久。乔治·凯南本人也被称为“遏制之父”。关于乔治·凯南其人及其遏制思想的研究与讨论,多年来也成为美国学者的热门课题。大体上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指责、批评凯南遏制思想的较多。由于凯南强调以政治手段遏制苏联,而反对过分使用军事压力,因此,他往往被称为绥靖主义者。八十年代后期,苏联、东欧急剧变化,美国学者开始重新评价凯南及其遏制思想。这时,他们大多认为凯南的遏制思想是一个有远见的深刻的战略思想,认为他在四十年代的预言,现在已经得到证实。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相继出版了一批研究凯南及其战略思想的专著。而在此以前,评论凯南的文章虽多,却很少大部头著作。

乔治·凯南及其遏制战略思想,对中国学者并不陌生。它们在中国有关论著和文章中经常出现,而且好几种凯南著作的中译本均已出版发行。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凯南的专著在中国出版。仅靠一些书刊中对凯南的零星介绍,自然不易使人对其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显然,系统、全面地研究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想,其意义不只在理解战后美苏关系,而且对理解当前和以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也十分重要。因为苏联虽然解体,但遏制战略思想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却并非烟消云散。它们将仍会改头换面地体现在今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特别是针对那些被美国视为“非我族类”的国家。

本书是中国学者研究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第一部系统、全面的专著。不仅如此,即使在国外汗牛充栋的研究凯南论著中,像本书这样专门分析凯南遏制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发展经过,理清其来龙去脉及其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的得失和今后影响的系统专著,也尚未多见。

作为一项科学研究,自然要参考、借鉴并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但重要的是研究者自己能在科学宝库中增添些什么。由于本书作者能刻苦钻研,独立思考,不满足于吃“别人嚼过的馍”,因此本书中新意、创见甚多。首先,作者把凯南在战后的大量政策主张集中归纳于其遏制思想的大框架中,并且从目标和手段两大方面,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层次分明的认真分析。同时对凯南的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主张的区别,前期与后期思想的变化,以及凯南前后自述的矛盾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次,作者认真研究凯南“遏制”概念的含义,并就凯南“八千字电报”中的 force 一词,请教凯南,已经年近九十岁的凯南在给作者的亲笔回信中,对他使用“force”、“counterforce”(见“X文章”)等词汇作了第一手的权威性解释。而这些概念,在国外其他著作中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作者还把凯南遏制思想的发展历程,扣紧美国战后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对苏联战略的发展变化,进行具体的、令人信服的对比分析与论证。这也是其他美国著作中未曾有过的。最后,作者根据凯南遏制思想本身以及它对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制定对苏战略的实际影响,从思想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分析中,提出了自己对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新界定,即:凯南遏制战略是一种夹杂着理想主义成份的不纯的现实主义思想,同时,它又是一种有自身特色的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我认为,这种界定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本书作者张小明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本书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多年来研究乔治·凯南的一次学术总结。当作者还在大学本科学习时,即对凯南的遏制思想发生兴趣,并着手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作者更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找到的美国档案史料以及书刊论文,特别是凯南自己的讲话、文章和著作。作者在比较全面、系统和翔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人所共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它的科学性所在。而从本书的分析论证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每一论断,都建立在可靠论据的基础上。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不以政

治上的好恶来作轻率的主观臆测,在这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自然,作为一位青年学人,面对这种难度较大的课题,总未免会有某些力不从心之处。例如有些分析如何更全面,有些论断在分寸掌握上如何更准确等等,都还存在一些有待斟酌之处。这些地方,热诚期待着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作为本书作者的学位导师,我不想有任何溢美之词,然而我确实为国际政治学术领域内的这一可喜成果,而感到衷心快慰。

赵宝煦

1993年12月

目 录

序	赵宝煦	I
引 言		1
第一章 遏制思想的形成和提出		3
第一节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		3
第二节 美国对外战略大调整		4
第三节 凯南对苏认识的形成		6
第四节 “八千字电报”		10
第五节 “X 文章”		15
第二章 遏制的目标		25
第一节 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		25
第二节 遏制三个层次的目标		26
第三节 “遏制”和“解放”		31
第四节 遏制的重点		33
第三章 遏制手段之一：政治遏制		42
第一节 遏制的主要手段		43
第二节 保持西方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		46
第三节 鼓励和利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		52
第四节 促进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		64

第四章 遏制手段之二:军事遏制	93
第一节 遏制手段的次要方面	93
第二节 军事威慑	95
第三节 西方的“定心丸”和外交后盾	98
第四节 有限战争与军事干预	100
第五节 核武器的遏制作用	104
第五章 凯南的遏制思想与战后美国对苏战略	112
第一节 凯南的遏制思想与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战略的 确立与推行	112
第二节 凯南的遏制思想和 1950—1989 年美国政府对 苏战略的制订与推行	120
第三节 凯南的遏制思想与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	126
第六章 对凯南遏制思想的几点评价	133
第一节 现实主义思想	133
第二节 和平变革战略思想	141
第三节 凯南遏制思想的效果与影响	144
乔治·凯南简历	149
参考材料	151
后记	166

引 言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对外战略时,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遏制苏联是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条主线。换句话说,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遏制苏联。而美国政府遏制苏联的战略则是建立在系统的遏制理论或者遏制思想基础上的。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西方战后时期的大战略一直是建立在遏制理论基础上的,即:挫败苏联的扩张目标以期使苏联有朝一日不得不面向其内部的种种矛盾。”^[1]

美国著名的“苏联通”乔治·F·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 1904——)可以称为“遏制之父”,因为他是最早提出和系统阐述遏制苏联思想的人。正因为如此,战后四十多年来凯南在西方声誉甚高,被称为“美国杰出的战略家”^[2]和“美国最有思想的外交家”。^[3]也由于这个原因,我把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以期认识和理解二战以后美国对苏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随着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美国对苏遏制战略也就寿终正寝,尽管美国朝野至今仍对俄国怀有戒心。苏联的解体给我们研究凯南的遏制思想和美国的遏制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这使我们可以考察美国对苏遏制思想的提出、发展和实施的全过程及其效果。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本书的第一章首先从战后初期的国际局势、美国统治集团的愿望以及凯南个人的经历等等,阐述与分析凯南遏制思想的形成与提出。凯南的遏制思想是个战略思想,它同所有战略一样包含追求的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手段两方面内容。对遏制目标及手段的分析构成本书的核心部分(第二、三、四章)。第五章论述凯南的遏制思想同战后从杜鲁门到布什的美国历届政府对苏政策之间的关联。最后一

章是总结,从总体上对凯南的遏制思想进行评价。

注 释

[1]乔治·布什 1989 年 5 月 24 日在美国海岸警卫学院的演说。1989 年 7 月美国《国务院公报》(George Bush, "The Future of Europ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1989)。

[2]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语,见施密特:《西方战略》中译本,第 17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

[3]美国外交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语。见莱弗勒:《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外交史》,1991 年春季号(Leffler, "Was the Cold War Necessary?"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91)。

第一章 遏制思想的形成和提出

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是战后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凯南自二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对苏认识之结晶。

第一节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政府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苏联,甚至参加了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等敌视行动。三十年代初,欧亚法西斯主义兴起,美苏两国开始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并且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西方其他大国纷纷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资产阶级也希望同这个大国建立商务关系。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主张同它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经过双方的努力,1933年美苏建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美苏两国国家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与威胁,美国同苏联结成了同盟,两个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在战争中密切合作。

可是,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 and 苏联逐步从盟友变成敌国。这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维系大国战时同盟的纽带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与表面化。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后果之一是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和苏联在战后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特征是“两极化”,即“新的权力天平上只剩下美苏两国”。^[1]从历史上看,在“两极化”的国际体系中,两强之间是

难以和睦相处的,任何一方都视对方的所得为自己的所失,认为盟友受到威胁就是自己的安全受到损害,从而导致日益加剧的相互敌视与争斗。^[2]况且,这种“两极化”的力量格局是同两大思想体系、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交织在一起的,从而使战后美苏对抗不可避免。

总之,主要因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美苏两国战后逐步从盟友变成敌手。战后初期,双方在东欧、德国、伊朗等问题上严重对立,而且矛盾愈演愈烈。凯南的遏制思想便是在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国际环境之下提出来的。

第二节 美国对外战略的大调整

战后初期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促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对外战略进行调整。美国朝野不少人士提出美国应凭其实力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取代十九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为此应当以苏联这一严重阻碍美国实现其全球霸权目标的国家为主要敌手。罗斯福制定和执行的与苏友好、合作的政策已不能适应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因而逐渐为杜鲁门政府所抛弃。战后初期,美国的对外战略处于大调整之中,其核心是制定新的对苏战略。

从二战后期开始,美国当权者中的不少人便提出美苏冲突不可避免,主张改变美国的对苏战略。大战后期美苏在波兰等问题上的争执,已使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他曾为美苏战时同盟的建立与维持出过大力)对美苏战后合作的希望发生了动摇。1945年4月,他向新任总统杜鲁门建议美国在东欧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并且以战后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等为筹码迫使它作出让步。^[3]有“对苏强硬派中的最强硬者”之称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后出任美国首任国防部长)十分赞同哈里曼的观点,甚至在二战尚未结束就主张同苏联“摊牌”。^[4]杜鲁门的其他重要顾问如海军上将李海和副国务卿格鲁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苏联有扩张主义倾向,战后不可能维持美苏战时那

种合作关系。1945年4月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对苏联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1945年4月20日他对来访的哈里曼说,他不怕俄国人,打算采取坚定的态度,认为“俄国人需要我们,甚于我们需要他们”,^[5]三天之后杜鲁门竟当着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面粗暴地指责苏联违反雅尔塔协议。^[6]二战结束之后,这些人对苏联的态度更加强硬。比如1945年12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同苏联达成妥协:苏联支持美国的国际原子能计划,美国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杜鲁门知道后极为恼火,指责贝尔纳斯“姑息”苏联,并在次年1月5日当着贝尔纳斯的面指责他对苏联不够“强硬”。^[7]

总之,美国统治集团在二战结束后(严格地说是从二战后期开始),开始重新估价其战时同苏联合作、友好的政策。不少头面人士主张改变这一政策,推行以苏联为敌国的新的对苏战略。战后初期美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苏战略因而处于大调整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的“决策精英”们日益感到需要有人对苏联进行系统的、理论的分析,全面阐述美国的对苏战略。比如主张改变美国对苏战略的强硬派代表、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就对分析苏联的行为动机极感兴趣,并且长期苦于找不到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他曾委托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爱德华·威利特(Edward F. Willett)研究美国所面对的“迷一样的俄国”,搞清它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实体还是一个狂热奉行宗教般哲学的民族实体。^[8]“苏联通”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情报委员会(The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等要人与机构也对苏联的行为动机和美国的对策作了分析和阐述。但是上述个人与机构的努力,都因为理论分析不足,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没能满足美国决策人的要求,因而没有得到足够注意。战后初期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乔治·F·凯南于是便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他系统地阐述其对苏遏制思想,并对战后美国对苏战略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节 凯南对苏认识的形成

凯南的遏制思想是在战后初期才提出来的。但是,他的遏制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其早在二战前及战时就形成了的对苏认识和政策主张的集中体现。所以,在阐述和分析凯南遏制思想之前,有必要简单叙述凯南的一些经历和他在战前和二战当中对苏联的认识和政策主张。

乔治·凯南 1904 年 2 月 16 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Milwaukee, Wisconsin),其祖先是十七世纪迁居北美大陆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他的父亲(Kossuth Kent Kennan)是家族中最早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之一,担任过威斯康辛中央铁路公司(Wisconsin Central Railway)的职员,精通税务法,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凯南便是在他后来称作为“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的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他的童年的。^[9]1921 年至 1925 年间,他就读于东部著名的私立大学——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尽管凯南在普林斯顿上学时是一个成绩平平、不引人注目和自卑感很强的学生,^[10]但几年的大学生活却为他日后卓有成绩的外交和学术生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其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普林斯顿时专攻历史,重点是近代欧洲外交史,并对地缘政治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影响了他后来对国际政治以及苏联内政与外交的分析和估价。^[11]

1925 年凯南大学毕业后报考职业外交官,很幸运地成为 17 名被录取者之一(共有数百人报考)。次年秋天,他进入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学校(Foreign Service School, Washington, D. C.),接受为期 7 个月的专业训练,结业后被派往美国驻日内瓦、汉堡等地的领事馆供职,开始其外交生涯。但是凯南很快就对领事官员的琐碎工作感到厌烦,并产生辞职离开外交界的念头。在老师及前上司威廉·达森(William Darson)的劝说下,他决定留在外交界,并且选定俄语为自

己的专修科目。凯南决定学习俄语和研究苏联,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二十年代末,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已站稳脚跟,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西方大国已同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急需精通苏联事务的人才;二是老凯南的榜样。后一个因素的影响大概比第一个因素要大,所以需要较详细说明一下。老凯南(George Kennan, 1845—1924)是凯南祖父的一个堂兄,20岁时曾作为美国电报公司的工程师考察过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写过一本颇受欢迎的书——《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Tent Life in Siberia)。后来,老凯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于1885—1886年间专门调查了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因此写成了影响深远的二卷本著作——《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该书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是当时西方人了解沙俄及其流放制度的教科书,影响相当广泛。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加里宁等人都曾对老凯南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著述给予过很高的评价。^[12]后来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老凯南关于沙皇监狱制度的作品,并且“为之而内心激荡不已”。^[13]除了写作,老凯南还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多次发表演说,对政治流放犯难以忍受的状况进行真实的描述,影响也很大。例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听了老凯南的演说后说道:“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指沙俄政府——作者)只能用炸药才能被推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祈求上帝赐予炸药。”^[14]老凯南的著述与演说,使他成为当时“美国的头号俄国事务专家”。^[15]同时老凯南也由于对沙俄的无情揭露和抨击,激怒了沙俄统治者,被沙俄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16]乔治·凯南虽然只在小时候见过一次老凯南,但后者对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可以说,老凯南对他选择研究苏联问题的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凯南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脑中有老凯南创立的家庭传统。”^[17]

1928年夏,凯南被派往苏联的近邻波罗的海三国接受(实地)训练,成为美国“第一批受专门训练的俄国问题专家”中的一员。^[18]从1928年夏至1933年夏,除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方

学院(Oriental Seminar,该学院是俾斯麦创建的,用以训练派往东方各国的外交官。——作者)进修外,凯南是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度过的,主要任务是在俄国流亡者的辅导下学习俄语和从当地收集、研究有关苏联的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报告。凯南在此时已显露才华,他撰写的几篇有关苏联经济状况的报告为美国政府所注意。在波罗的海国家生活的几年,可以称为凯南对苏认识初步形成的阶段。凯南同其他的在那里受训的美国年轻职业外交官(如查尔斯·波伦,二战中曾任罗斯福总统的译员,五十年代中期出任美国驻苏大使。——作者)一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出生于盎格鲁—萨克森中产阶层家庭,在东部私立大学接受教育,脑中有根深蒂固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对共产主义怀有本能的敌视。二是根据1924年罗杰斯法案(Rogers Act,关于外交官职业化。——作者)进入外交界的职业外交官。训练他们的老外交官(在国务院或驻在国工作)给他们灌输的是威尔逊国际主义思想包括世界秩序、繁荣、和谐、自由企业与民主等观念,也使他们对苏联的制度有很大的反感。三是在波罗的海三国受大多同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旧俄流亡者的影响很大,这增强了凯南和其他年轻外交官对苏联与共产主义的仇恨。^[19]因此,这个时期凯南对苏联的认识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美国同苏联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并反对美国承认苏联。1931年凯南这样写道:“苏维埃俄国现存制度同我们的传统体制是永远对立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道路或妥协,想通过建立外交关系或其它方式调和两种制度的努力注定要失败。除非美苏之间用一条经济封锁线隔开,否则两种制度不能共存,在20或30年内,或者俄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我们共产主义化。”^[20]他对美苏商务关系的前景很不乐观,认为外交上承认苏联不会促进两国的贸易。他对罗斯福以承认苏联来制约德国或日本的设想也表示怀疑。^[21]总之,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凯南形成了美苏必然对立、互为敌手的思想。几十年后,凯南在回忆录中承认:“我当时(指三十代初。——作者)和以后从不认为苏联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实际上或潜在的合格的盟友”。^[22]

1933年10月,美苏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罗斯福总统任命曾与列宁打过交道的威廉·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为美国首任驻苏大使。凯南此时正在华盛顿休假,被一位朋友引荐给布利特。布利特为凯南流利的俄语和极强的思辨能力所打动,当即决定要任用他,并与里加公使馆(凯南当时为美驻里加公使馆三秘)交涉要人。^[23]同布利特谈话后没几天,凯南便作为助手和翻译,随布利特到莫斯科递交国书和选择大使馆馆址。从1933年底至1946年初,除了1937年担任过短期的国务院欧洲司俄国处处长和1938年初至1944年夏在布拉格、柏林、里斯本和伦敦美国外交使团供职外,凯南是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渡过的。他先后担任过美驻苏使馆三秘、二秘、公使衔参赞和代办,成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在驻莫斯科使馆工作的几年是凯南对苏认识最后形成的时期。凯南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不仅没有变化,而且还由于亲眼目睹苏联的“大清洗”和对外国人的限制而对苏联政权更为仇视。但是,这个时期凯南对苏联的认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更多地从政治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苏联的内政与外交。他认为,苏联的行为主要是由其“传统和环境”所决定的,可以从地理、心理和历史等因素解释苏联的行为动机。^[24]例如1937年,凯南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人具有东方人在经济交往中那种猜疑和官僚的特性,因此苏联在经济上是美国的敌手而非伙伴;在文化上俄国人有一种自卑感,害怕外国对其国民的影响,当权者努力使其人民与外界隔绝;政治上俄国人具有传统的猜疑心理和缺乏自信心,这与其气候、长期同游牧民族为邻、受中世纪拜占廷的影响等有密切的关系。他由此预言美苏关系的前景不是令人乐观的,两国未来的关系中将“充满误解、失望和相互指责”。^[25]又如1938年他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俄国人在其很长的历史中受亚洲游牧民族(Asiatic hordes)的影响,习惯把外国人当作敌人。他认为亚洲人那种“强烈的、变态的‘面子’与尊严”促使俄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俄国辽阔的国土使得俄国人不具备调和的精神,而带有极端主义的倾向。俄国人的性格中既有“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痕迹,